

第六辑

The sixth series

湛小灵 主编

明清海防

Study of the Ming and
Qing Hai Phong

研究

广东
历史



THE OPIUM WAR MUSEUM



ISBN 978-7-218-08495-4



9 787218 084954 >

定价：50.00元

明清海防研究

Study of the Ming and
Qing Hai Phong

第六辑 The sixth series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湛小靈 主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海防研究 (第六辑) / 湛小灵主编.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218-08495-4

I. ①明… II. ①湛… III. ①海防—军事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E2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2067 号

MINGQINGHAIFANGYANJIU

明清海防研究 (第六辑)

湛小灵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柏峰 李展鹏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东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8495-4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75 插页: 1 字数: 297 千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林则徐、魏源思想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影响	史滇生(1)
明代中期浙江海防考	宋 焯(11)
略论清代枪械技术发展的军事影响	宋海龙(28)
吏治·关防·海防与禁烟——解读“虎门销烟”	郑剑顺(38)
西学东渐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军事技术交流	薛学共(46)
两次鸦片战争后虎门炮台的重建与改建	黄利平(55)
海外史料中的闽商与福船	袁晓春(68)
浙江乐清明代海防与抗倭设施考略	陈元友(75)
明代朱纨整饬海防	韩 宇 吴 江(80)
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制炮技术优劣研究	刘鸿亮 姚锦鸿 尚元正(84)
明代海防文献略考	陈 列(115)
明代现存海防著作与海防思想论纲	李新伟(129)
中国古船的种类	袁晓春(136)
19 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总体水平研究	刘鸿亮 陈振忠 崔萍萍(142)
洋务运动时期海防思想的萌发	孙成华(186)
方鸣谦与明初海防	叶艳莉(202)
蓬莱水城城墙的形成与修复	杨 猛(209)
清代福州驻防水师旗营述略	周文博(215)
鸦片战争前后中美关系的变化	于英红(225)

林则徐、魏源思想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影响

史滇生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的一批先进人士，以新的思考方式，探讨挽救民族危亡之道，研究强兵御敌之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防战略思想，对中国军事近代化和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

林则徐在领导广东军民抗英斗争中，对中国海防海军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思想主张。魏源在接受林则徐思想和他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标志着林则徐、魏源海防海军思想的形成。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分析中国海上安全形势，力主“筹海”。

“筹海”是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的一个重要思想。所谓“筹海”在当时说来，就是面对中国海上安全的严峻形势，整顿和加强海防海军，抗御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这是近代中国海权意识开始觉醒的一个体现。

“筹海”是建立在了解夷情、对中国海上安全形势有着清醒认识基础上的。林则徐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海上侵略，“是其秉性所为”，英国“唯利是图”，掠夺海外财富是其“本性”，由于鸦片能获重利而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原属意料之中”^①，而且“夷情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因此，对英国的海上侵略，必须“一决坚持，不因其恫吓刁难，稍为动摇”^②。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认真筹划海防事务，准备应对英军的海上进攻。他不仅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海防战略方针，而且积极采取措施，整顿水师，改善水师装备，加强海防工事，建造新炮台，购置洋炮，加强广东沿海防御。还提出“静则严防，动则进剿，总不稍示柔弱”，“守险攻暇，皆得随机应变”的作战思想。表明他已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海上入侵对中国造成的威胁，认识到筹办海防的重要性。

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以《筹海篇》为中心内容，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海

上安全形势的关切和对加强海防的重视。《海国图志》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的概况，分析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海外诸邻国的形势，揭露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提出了加强中国海防抗御西方列强海上入侵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他指出，西方列强“唯利是图，唯威是畏”。英国是一个侵略扩张成性的国家，奉行“兵贾相资”的方针，以通商为名，行侵略之实，“凡商船所至之口，视其守御之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为属国，或夺踞为分国”，并对中国“久存垄断之心”，^③应改变“治内详、安外略”的方针，“以治内为治外”，切实加强中国海防，抗御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

在抗英斗争和林则徐、魏源“筹海”思想影响下，鸦片战争时期面对深重的海防危机，中国朝野纷纷议海防。所议范围从造船购炮，选将练兵，水师整顿，水勇招募，炮台建设，要隘设防到吏治整顿，兴办民团等，均有不同程度涉及。虽然这些关于海防和水师建设的议论具有很大自发性，提出的各种主张也未被清政府采纳实施，但却形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股海防思潮，对清政府尔后的“筹海”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总结抗英作战经验教训，提出建立“船炮水军”。

鸦片战争中，中英之间的作战主要是海防海军作战。林则徐通过对鸦片战争抗英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认为中国“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是导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抗御西方列

强的海上入侵，必须依照“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要求，建立一支新式“船炮水军”，“与敌海上交锋”。强调“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④如建立一支“船炮水军”与敌“追逐巨浸之中”，则敌所能去处我亦能往，能与敌在海上争锋，改变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建立“船炮水军”事关中国国防大局，断非可有可无之事，应“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强调“此系海疆长久之计”^⑤，不可等闲视之。主张这支“船炮水军”应拥有大型战船100艘、中小战船50艘、大小火炮1000门，并从民间招募“敢死之士”组成水兵5000人、舵工水手1000人，建立独立的指挥机构“为之指挥调度”，选拔精明强干、筹划周详、善于将将、能为兵弁表率的人员充当“水军总统”。

魏源也认为，西方列强“所长在海”，应在整治水师的同时，购造西式船炮，建立一支拥有战舰100艘、火轮10艘、官兵3万，“可以使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新式水军，平时分驻各省沿海巡弋，战时统一调度互相支援，“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⑥

林则徐、魏源建立新式“船炮水军”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依照西方舰船火炮样式装备起来、能在外海作战的轮船水师。这是近代中国建立新式海军的最早呼声。

第三，全面审视夷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防战略思想。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全面地审视了敌情，他们既看到英军船坚炮利的优势，承认中国军队在军事技术方

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但又不甘落后，而是主张急起直追，引进和仿制西方的先进舰船火炮，以加强国防、抗御西方国家的海上入侵。

林则徐最早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⑦的主张，并且是这一主张的最早实践者。他在广东禁烟期间，组织人员翻译国外有关制造火炮的书籍，并从美国商人手中购买一艘商船，改装成为设有34门火炮的战舰。还仿西方样式建造战船2艘，以加强广州海口设防。

对“师夷长技”思想作了比较全面深入阐述的是魏源。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⑧，把学不学西方长技提到国防战略全局的高度。《海国图志》各部分都围绕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而展开。他认为，西方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为“师夷长技”，可“立译馆，翻夷书”，向国内介绍西方技术；聘请西方工匠来华，传授船炮制造使用技术；从外国购买船炮枪械，改变清军装备落后状态；建立造船厂、火器局仿制，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主张在广东虎门沙角、大角二处，“官修战船、火器局”，并“善立章程”，加强管理；同时允许沿海商民“仿设厂局，以造船械”，“佐战船之用”。^⑨此外，还应学习西方养兵练兵之法，作为对清军“对治之药”。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近代中

国军事变革，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林则徐、魏源关注国家海上安全，力主“筹海”，建立船炮水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海权意识开始觉醒的重要体现。这些思想主张，虽然当时未被清朝统治当局接受并付诸实践，但是，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海防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清朝统治当局不得不认真审视中国海防问题，筹措海防，师夷长技，以实现“军事自强”。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在清朝统治当局“军事自强”活动中，被许多人认识接受和继承发扬，并付诸实行，显示了它的光辉和生命力。在海防海军建设方面，林则徐、魏源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林则徐、魏源的“筹海”思想，推进了清朝当局对海防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为创建新式海军创造了思想前提。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朝当局认识到，海洋已不再是中国国防的天然屏障，而是中国国防的第一线。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颺举，无足当之。”^⑩海上安全的危机感，迫使清朝当局提出：“海防亟宜筹划”^⑪。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进行的第一次海防筹议，参议者虽然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但都认识到外敌的海上入侵，动辄

制我要害，志在鲸吞，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¹²，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¹³海防一事，已成为“今日全局第一要务”¹⁴，切不可缓。应“认真办理，不容稍懈”。据此，1875年5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指出：“海防事关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不可空言了事，因循废弛。亟宜未雨绸缪，通盘筹划，渐次举行，持之以久。¹⁵同时确立了陆海并重的国防方针，改变了重陆轻海的观念，第一次将海防提到国防战略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对待。这表明，林则徐、魏源的“筹海”思想已成为清朝统治当局的共识，没有这种认识，就不可能有海军建设。这是创建新式海军的思想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廷决定以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南洋海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

第二，林则徐、魏源建立“船炮水军”的思想，是建立中国近代海军的最早主张，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起了先导作用。

林则徐和魏源在提出“筹海”思想时，就将建立“船炮水军”作为实现“筹海”目标的最重要内容。当时，他们虽然没有提出“新式海军”这一概念，但是，“船炮水军”从其实质来看，就是与中国旧式水师不同的新式海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推行洋务自强活动，筹措海防时，洋务派继承了林

则徐、魏源的思想，将组建轮船水师作为加强海防的首要任务。“轮船水师”实际上就是林则徐、魏源提出的“船炮水军”。洋务派认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罕见。若能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渐失其所恃”。购置外洋船炮组建轮船水师已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¹⁶，建立“外海水师极为当务之急”¹⁷，强调筹划海防“非将旧制水师改为轮船水师不可”¹⁸。

在经历了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洋务派中的不少人认为，面对西方国家海上侵略的威胁，“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¹⁹，“制造轮船实为救世要策”²⁰，必须多造兵轮，防御各海口，对付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认为“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学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²¹。1867年起开始在上海江南制造局自制新式兵轮。1868年中国第一艘新式兵轮“恬吉”号下水。与此同时，左宗棠、沈葆楨也创建了福建船政局，建造新式兵轮。1869年，福建船政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1870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各自建造出几艘新式兵轮后，曾国藩即上奏清廷：“兹当闽、沪两厂船成之时，即当于两处选立统将，慎择船主，出洋操练，无论有警无警，穷年累岁，练习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终有可以即戎之时。”²²提出了组建轮船水师的思想。此时，船政大臣沈葆楨也提出了组建轮船水师的主张，奏请清廷将福建船政制造的兵轮组织起来，

“联络一气，以壮声威”，并委派“熟悉海疆的大员”为轮船统领，建成一支轮船水师。

洋务派还规划了轮船水师的组建方案。1867年，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草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认为“外海水师以火轮为第一利器，尤以大兵轮为第一利器”，“海上争锋，纵有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抗御西方列强海上侵略“非轮船不为功”^②。主张根据中国海域宽阔、绵延万里的特点和海防任务需要，设立北洋、中洋、南洋三支轮船水师。每支水师配新式大兵轮6只、炮船10只，合计48只。各支水师设提督1人，每半年会哨一次，一旦海上有警则互相支援。丁日昌建立三洋海军的主张，是中国组建海军舰队的最早方案，是对林则徐、魏源建立“船炮水军”思想的继承和具体化，对后来清政府海军的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1874—1875同光年间的海防筹议，中心是建立海军问题。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筹议开始就提出“另立海军”，以取代旧式水师。这次海防筹议的参与者对“另立海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也基本一致。经过这次筹议，清政府确立了建设中国近代海军的方针和方案。林则徐、魏源建立“船炮水军”的思想主张，成为清政府的实践。

第三，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促进了中国军事工业的兴建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师夷长技”是清政府推行洋务自强

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清政府进行海军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师夷长技”贯穿于海军建设的全过程，它对海军建设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多方面的和深刻的。

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逐步为清朝当局所接受并付诸实行，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自强活动兴起之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事实践，清朝统治当局逐步认识到西方战船、火炮和养兵练兵之法的优越，开始在这些方面向西方国家学习。

清朝当局“师夷长技”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造船制炮。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就向清廷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③这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发展。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军事变革呼声。随后，李鸿章也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觅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④。“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思想主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建。正如左宗棠所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系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⑤。在“师夷长技”思想指导下，清朝统治当局将“制器”和“练兵”一道，作为实现军事自强的根本措施，从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陆续兴建了一批使用西方机器和技术的军事工业，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新式军事工业企业已近30个，最著名的有江南机器

制造局、福建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其中，福建船政局和江南机器制造局是这期间中国新式兵轮的主要自制基地，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甲午战争前，福建海军 20 艘军舰中有 15 艘军舰为福建船政局所建造，南洋海军 23 艘军舰中有 14 艘为福建船政局和江南机器制造局建造，广东海军 25 艘舰船有 9 艘为福建船政局建造，即使是以外购舰船为主的北洋海军，也有 5 艘国产舰船。

清朝当局“师夷长技”的第二个举措是聘请西方工匠来华传授西方舰船制造技术。

为尽快掌握西方先进船炮制造技术，洋务派还继承了林则徐、魏源聘请西方工匠来华传授技艺的思想主张，聘请了一批西方科技人员到中国帮助中国员工学习舰船制造技术，认为“夫习造轮船，非徒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耳，欲广其传授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②，强调“不重在造而重在学”^③，在学习制造中掌握西方长技，“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④。在这方面，福建船政局是突出的代表。船政局先后聘用洋匠 52 人，在车间指导中国工人的外国技术人员先后有 35 人，是全国军工企业中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最多的一所。他们在清政府“权自我操”的原则下，设计船厂，传授造船工艺和科技知识，担任船政学堂的教学，使中国员工较快地掌握了新式舰船制造技术。到福

建船政局 1907 年停止造船时为止，共造出新式舰船 40 艘，是国内舰船制造的主要基地，为中国各支海军提供了许多舰船装备。

清朝当局“师夷长技”的第三个举措是设立译馆，翻译西方军事和科技书籍。

为尽快掌握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探求新式舰船制造的“本源”和驾驶原理，清朝当局还提出设立译馆，翻译西方军事和科技书籍以“穷流溯源”。提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源。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查。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⑤。不翻外国科技书籍就无法真正做到“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基于此认识，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内设立翻译馆和印书处，聘请一批中外人士翻译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和军事方面的书籍。这是对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组织人员翻译西方书报，了解西方国家情况做法的继承发扬。江南制造局译馆成立后的 40 年中，先后出版西方译著 23 类 160 种 1075 卷。其中，不少是关于海军和海防方面的书籍。《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铁甲丛谈》、《外国师船图表》等对英、美、法等国海军历史和现状作了较详细介绍；《英国水师律例》、《水师章程》以及《美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书中的部分内容，介绍了西方国家海军制度；《海防新论》、《兵船炮法》、《轮船布阵》、《水师操练》、《海军调度要言》、《海战指要》、《布国兵船操练》等介绍了西方国家海军作战理论和训练方法；《汽机发轫》、《汽机新制》、《汽

机问答》、《兵船汽机》、《制机法理》、《船坞论略》等介绍了西方国家舰船制造技术；《航海章程》、《行船免撞章程》、《航海通书》、《行海要术》、《海道图说》、《测海绘图》等介绍了西方海军舰船航行驾驶规则和航海知识。这些书籍的译介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舰船制造技术的提高，海军衙门的建立，《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中国海军尤其是北洋海军的作战训练，都不同程度地从这些译著中获取了知识，受到借鉴和启发。

清朝当局“师夷长技”的第四个举措是建立海军学堂，培养新式海军人才。

还在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就提出，应改进水师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在沿海各省科举考试中增设水师一科，将能制造西洋战舰、火炮、水雷者，熟悉海上天文气象，能驾驭巨涛和准确施放枪炮者考试录用，分发沿海水师，将其培养为新式水师人才。

洋务派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思想，认为中国建设海军根本在人才。一支新式海军不仅要“有器”，“尤需有人”，^⑤“战人较战具尤为急”^⑥，“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⑦。强调“海防无他，得人而已”^⑧，海军建设应将人才的培养放到首要地位。

洋务派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师夷长技”。认为西方先进船炮的制造和使用，是博大精深的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而这些在中国私塾学馆中是无法学到的。中国八股科举制度已不可能造就新式“水陆之将才”，必须参照西法，“设立洋学局”培养新式海军人才。

认为新式学堂是海军人才“造就之基”，海军人才的培养造就应“以学堂为根本”，“非多设学堂，不足以资造就”，^⑤“除学堂、练船外，实无可造就将才之处”^⑥。将开办新式海军学堂作为“师夷长技”建设海军的基本途径。在此思想指导下，1867年1月开办了福建船政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海军学堂。船政学堂在学生招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均与八股科举制截然不同，制定了有较新色彩的办学章程，聘请了洋员教授课程。1880年清政府又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⑦。此后，中国又陆续开办了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昆明湖水操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水鱼雷学堂、天津海军医学堂、烟台海军学堂等新式海军学堂。这些海军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了许多人才。这是“师夷长技”思想在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为“师夷长技”，培养新式海军人才，清朝当局还向国外派遣军事留学生。早在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就联合上奏清廷，提出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探求掌握西方长技的“本源”。以“师彼长技，助我军谋”^⑧。获准后，中国派遣了120名幼童赴美国学习军政、船政和制造等。船政大臣沈葆楨也认为，选拔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赴英、法学习海军驾驶和轮船制造，“探究其造船之方及推陈出新之理”，“探究其驶船之方及练兵制胜之理”，可以使中国海军“人才源源而来”。^⑨福建船政毕业生甲午战争前先后分三批赴英国学习驾驶，

赴法国学习舰船制造。他们学成归国后，有的成为海军舰船制造专家，有的成为海军学堂主持者，更多的成为北洋海军重要将领，为中国海军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

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在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效。北洋海军的成军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师夷长技”在海防海军建设中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第一，北洋海军成军和北洋海防建设成就，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师夷长技”在实现“船坚炮利”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果。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有“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超勇”、“扬威”7艘巡洋舰，6艘“镇”字号炮舰，6艘鱼雷艇，3艘练习舰和1艘运输船，数量和性能均居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和广东海军之上，实力在远东各支海军中首屈一指。北洋海军旅顺、威海军港堪称远东一流。旅顺、大连、威海、刘公岛、山海关、大沽口等地海防炮台火炮数量之多、建筑和装备近代化程度之高，是中国其他沿海口岸无法比拟的。此外，将铁路和电报用之于海防，也以北洋为最早最有成效。可以说，北洋海军的成军和北洋海防建设成就，代表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师夷长技”在武器装备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

第二，北洋海军集中展示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师夷长技”在海军教育训练方面

取得的重大成果。

创办新式军事学堂培养人才，改革军队训练内容和方法，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师夷长技”的一项重要内容。福建船政学堂是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海军学堂，其学生中的佼佼者大多集中于北洋海军，许多人都曾任北洋海军主要舰船的管带，还有许多人担任北洋海军的大副、二副、管轮。他们的军事知识在北洋海军中得到展示发挥。他们对北洋海军建设和作战作出的贡献，鲜明地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教育“师夷长技”的成果。

北洋海军还参照英国海军部编的《水师操练》进行单舰训练，参照英国海军的《轮船布阵》、《舰阵图说》进行阵法训练。每日有小操，每月一大操，两月一会操，还建立了检阅制度。北洋海军还聘请了一批洋员在舰船、鱼雷营和学堂作为教习。北洋海军的训练内容、方法和成效，是当时中国各支海军中最好的。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教育训练“师夷长技”成果的突出体现。

第三，北洋海军首开晚清军制变革先河，其制定的章程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师夷长技变革军制的最初成果。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师夷长技”主要是在武器装备和教育训练方面，军事制度的变革基本未实行。1888年颁行的《北洋海军章程》，是近代中国军制革新的最初尝试。这部章程“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尤其是英国海军规章制度，对北洋海军船制、官制、升擢、考校、俸饷、恤偿、军规、仪制、铃制、武备、后路保障等方

面都作了比较明细的规定。尽管章程中还保留许多新旧杂陈的内容，许多新规定还显得比较粗浅，而且在实践中也未能得到很好贯彻，但这部章程的制定，是甲午战争前在“师夷长技”革新军制方面的一次重要尝试，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军制变革的先声，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师夷长技”革新军制的初步成果。

【注释】

-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3页。
- ②《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4页。
- ③魏源：《海国图志·大西洋英吉利国二》。
- ④《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 ⑤《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 ⑥魏源：《海国图志》卷一，第1页。
- ⑦《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7页。
- ⑧魏源：《海国图志》卷37。
- ⑨魏源：《海国图志》卷2。
- ⑩《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上海书店1986年版，卷18，第2页。
- ⑪《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102页。
- ⑫《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81页。
- ⑬《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102页。
- ⑭《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54页。
- ⑮《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42页。
- ⑯《曾国藩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03页。
- ⑰《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三册，第266页。
- ⑱《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二册，第412页。
- ⑲《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上海书店1986年版，卷18，第2页。
- ⑳《曾国藩全集·奏稿》卷25，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0页。
- ㉑《曾国藩全集·奏稿》卷27，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页。
- ㉒《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二册，第276页。
- ㉓《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31页。
- ㉔《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70页。
- 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3页。
- 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9页。
- ㉗《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五册，第28页。
- ㉘《沈文肃公政书》卷四，第69页。
- ㉙《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四册，第244页。
- ㉚《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四册，第18页。
- ㉛《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三册，第8页。
- ㉜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笺折》。
- ㉝《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16页。
- ㉞《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⑳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2，第 22 页。

㉑ 《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二册，第 565 页。

㉒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3，第 7 页。

㉓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7，第 4 页。

㉔ 《沈文肃公政书》卷四，第 64 页。

（作者：史滇生，海军指挥学院）

明代中期浙江海防考

宋 烜

明代中期的浙江海防，总体而言是相对平静的。由于明初太祖朱元璋的重视，经汤和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悉心经营，沿海防卫体系基本成形，海防形势一度比较稳定，并由此奠定了有明一代海防的基本格局。进入明代中期，海防形势渐趋和缓，沿海防卫逐渐松弛，以致出现了桃渚城事件等，给平静的明代中期海防平添了一些乱象，也给日渐松弛的沿海防卫体系敲响了警钟。但相对早期的倭患频发、晚期东南沿海的倭乱大作，总体来看明代中期还是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

一、明代中期倭患情况

进入明代中期以后，浙江沿海一带的倭患发生率逐渐下降，“宣德以前，彼犹出没海滨，以为民害。正统以后，盖罕有至者矣”^①。从相关史书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倭寇事件相对较少，宣德年间（1426—1435）很少有倭寇来犯的记录。承平日久，由此也造成沿海防卫的一度松懈，所谓“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由于各地防卫相对松弛，故一旦发生倭患，往往就造成恶

性事件，如正统年间（1436—1449）的桃渚惨案即是如此。

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日，倭寇自浙江海门的蚶澳、亭屿二港登岸，进攻位于临海县的桃渚千户所。虽然倭寇人多势众，官军仍然尽力防守，一度城池几乎要陷落。但千户所千户徐忠、李海等率兵极力迎战，虽然负伤，仍顽强作战，最终擒获倭匪三人，斩首十级，余下倭寇带伤败走。倭贼败逃出海后，又遭遇海门卫巡海指挥路铎率领的军船追击，击败倭贼，又生擒倭贼三人，斩首七级，其余贼寇狼狽逃窜。^②

正统四年（1439）五月初一日，倭寇四十余艘，再度侵犯桃渚千户所，由于倭寇人多势众，最终城被攻破。倭寇攻入城内后，大肆杀虏，造成桃渚惨案。随后，倭寇又接连进攻宁波大嵩千户所，袭破所城，大肆杀戮。随后转寇昌国卫，攻陷卫城^③。

正统七年（1442）五月，倭寇二千余众进犯大嵩城，再次攻入所城，被杀官军百人，掳去军民三百人，粮食四千四百余

石，以及其他军器等。^④

正统七年七月倭寇进犯乍浦。第二年（1443）五月，进犯海宁、乍浦等处。《筹海图编》记载：“八年六月寇海宁乍浦诸处”^⑤。天启《平湖县志》记载：“正统七年七月寇乍浦”，“八年六月又来寇，百户徐荣战歿，并杀官军路德等，大掠而去”。^⑥《英宗实录》记载说：正统八年“五月十七日，倭贼寇海宁卫地方，官军击却之”^⑦。

正统七年十月寇壮士所。^⑧

景泰六年（1455），倭寇进犯台州健跳千户所。^⑨

成化二年（1466），倭寇再次攻陷大嵩所。倭寇伪称入贡，官军不为严备，遂袭破大嵩，官兵夜围其舟，檣灯达曙不移，倭船已乘潮遁去，其实檣灯插在沙上。^⑩

上述倭寇侵犯事件中，以桃渚惨案为最典型。正统四年（1439）五月初一日，倭寇攻入桃渚千户所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劫仓庾，燔室庐。贼杀蒸庶，积骸流血如陵谷，缚婴儿于柱，沃之沸汤，视其啼号以为笑乐。捕得孕妇，则计其孕之男女，剔视以赌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壮与其粟帛，席卷而归巢穴。城野萧条，过者陨涕”^⑪。倭贼来犯之所以防不胜防，有多方面原因。倭寇入侵，往往先以入贡的名义，一旦侦察到当地海防空虚，有空子可钻，就会肆意掠夺。浙江定海卫副千户王铠说：“倭夷奸谲，时来剽掠海边，见官军追捕，乃阳为入贡，伺虚则掩袭边境”。倭船有时也附载方物兵器等，游弋于浙江沿海一带，找机会与沿海

民间做些交易，一旦窥得地方上防卫有所松懈，有机可乘，即大肆抢劫：“时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是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矣。”^⑫可见，借着入贡的名义，借机劫掠百姓财物，这是倭寇所常用的伎俩之一。

倭寇入犯前还会派遣间谍，探听沿海虚实情况。如正统四年，倭寇侵犯桃渚千户所、大嵩千户所，就先派遣原籍浙江黄岩的周来保、原籍福建龙溪的钟普福登岸侦探，打探虚实，然后导引倭寇上岸，据记载：“浙江黄岩县民周来保，福建龙溪县民钟普福，洪熙间俱困徭税叛入倭。倭每来寇，辄为响导，杀掳桃渚、大嵩诸处皆与焉。至是，复道倭千余徒，欲寇乐清县，先登岸侦之。既而倭遁去，二人潜留县境，往来丐食，为县官所执，械至京，鞫得实，凌迟处死”^⑬。倭寇多计谋，善于摆迷魂阵。如前所述，成化二年，倭寇攻打大嵩千户所，先假称入贡船队，使守备官军不以为戒，失去了警惕，倭寇遂趁机发动进攻，于是攻破大嵩所城。随后战斗中，官军组织反击，入夜后包围了倭寇船队。倭人再次利用计谋，他们把檣灯挂在插在沙滩的竹竿上，假扮船队驻扎不动的样子，其实却趁着黑夜溜之大吉了。《郑开阳杂著》总结倭寇的计策说：“我师若胜，彼即奔去，俟我师争割首级，而四面合围之；或于战时分兵统出我师左右，先制乎胁，后击乎尾；或诱我师追至其营，但见财宝，不见贼众，及乘我师取宝，而袭杀之。此